

November 2014

The Narration of Desir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Novels and Modernity

Weiwei Fa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Fang, Weiwei. 2014. "The Narration of Desir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Novels and Modernit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4, (6): pp.146-150.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4/iss6/19>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晚清小说的欲望叙述与现代性

方 玮

摘要: 晚清小说产生于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急速转型时期,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文人心态形成了它不同寻常的面貌。其特有的欲望叙述不仅表现为颠覆传统的“过度之经济”,而且其“女性想象”和“城市书写”都带有强烈的现代气息。

关键词: 晚清小说; 欲望叙述; 过度之经济; 女性想象; 城市; 现代性

作者简介: 方 玮,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电子邮箱: fangweiwei198862@126.com

Title: The Narration of Desir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Novels and Modernity

Abstract: The Late Qing Dynasty was a period of rapid transi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to the modern society, and the novels produced during the period took on a special character due to society background and scholars' mentality. Not only does the unique narration of desire in the novels exhibit as "the excess of economy" that subverts the tradition, but also the imagination of the feminine and the urban writing took on strong atmosphere of the modern.

Keywords: the Late Qing Dynasty novels; the narration of desire; economy of excess; imagination of the feminine; city; modernity

Author: Fang Weiwei is a Ph. D. student in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with research focus 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fangweiwei198862@126.com

晚清小说产生于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急速转型时期,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文人心态形成了它不同寻常的面貌。为数众多的小说家将自己的笔锋对准花街柳巷中的倡优生活,尽情地勾勒淫靡香艳的肉感图景,其描写的尺度之大,常为后世的评论家诟病。鲁迅虽然早年学医,深知“食色,性也”的道理,但是也持伦理的批评,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这些作品统称为“狭邪小说”(202)。先生言下之意,这些作品是“不守正道”的小说形式。这种批评方法对晚清小说的研究可以说影响至深,从“五四”一直到现在中国学界都回荡着这样的声音,评论家们要么抱怨这些小说笔法粗糙,充满各种陈词滥调;要么站在传统儒家的道德立场,公开指责这些作品诲淫诲盗。总而言之,它们属于情色文学,这种“低劣”的文学形式只能败坏读者的良知。然而,在西方学术界,王德威、李欧梵、韩南、刘剑梅等一批富有才华的学者对这些作品却

另眼相看,他们不仅摆脱了国内学者长期抱持的道德立场,而且创造性地将“现代性”(modernity)这个西方文化理论研究的关键词,架构到中国晚清小说的研究之中。他们从现代性的角度,不仅大胆肯定了这些小说中“耸人听闻”的欲望叙述,还进一步挖掘出这一叙述所负载的现代文学内涵。对于晚清小说而言,这无疑是在研究方法上的重大突破。本文将欲望叙述为线索,从不同侧面考察晚清小说与现代性的关联。

一、晚清小说的“欲望叙述”与“过度之经济”

早在晚清以前,一些诗人和作家的作品就涉及男女私情。南朝的“宫体诗”、“艳情诗”就是典型的例子,不过,这些作品温婉含蓄,绝无淫秽之意。然而,到了明代,

在《金瓶梅》、《浪史奇观》、《如意君传》、《绣榻野史》等艳情小说中,作家们就不再遮遮掩掩,而是直陈其事。晚清小说的出现,不仅大大拓展了欲望实践的空间,而且在纵情声色方面与明代小说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张春帆的《九尾龟》、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陈蝶仙的《泪珠缘》、孙家振的《海上繁华梦》等作品都有大量的性爱描写,其露骨的程度简直令人瞠目结舌。这是否意味着晚清小说家较之前人更加猥亵?根据一些西方学者的分析,他们的情色想象和欲望叙述其实富含深意。譬如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王德威将这些话语称为“过度之经济”(economy of excess):“世人通常以为在妓院纵情声色乃浪掷身体,既耗精神,亦损财力,有害‘正常的’社会交往和两性行为。在倡优床榻挥霍性欲而至过度的地步,既无助于修身齐家,尤威胁传宗接代,所以在妓院里不断浪费支出,真真阻碍了(身体、欲望、资本)经济的积累。风花雪月之所得,每以伦理与经济领域之所失为基础”(69)。这段话有何深意呢?这还得从传统的价值观说起。

众所周知,修身养性是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历代学者对此都有所讨论。老子曰“见素抱朴,少私寡欲”(《道德经》)。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章句下》)。魏晋桓宽有言“放情者危,节欲者安”(《政要论·节欲》)。汉代刘安也说“省事之本,在于节欲”(《淮南子·诠言训》)。清代教育家申居郅也反复强调:“纵欲之乐,忧患随焉”(《西岩赘语》)。节制自己的欲望,不仅有益于身心健康,而且能够躲灾避祸。至于人的本能欲望,或者说原始性欲,在古人的眼里,只是为了传宗接代。乔治·巴塔耶认为这一传统中包含着一个重要的原则,即古典的功利性原则。这种原则将人类的实践活动统统纳入到“有用的”(useful)评判框架之中,它强调“生产”、“投资”和“积累”,反对任何形式的铺张浪费。巴塔耶认为,这是一种目的论的经济学,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因此需要各种各样的盘算、计谋和手段。巴塔耶相信,这种以攫取和占有为目的的有限经济既不是最初的经济活动的本质,也不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唯一样式。实际上,在人类的经济活动中,有两种不同的消费模式:一种是生产性的消费,这种消费是为了别的生产目的,或者说,是为了别的生产目的而消费,从而更好地占有和积累;另一种是非生产性的消费,这种消费没有任何功利性目的,只是为了消费本身(汪民安,“色情”190)。巴塔耶将这种非生产性消费称之为“耗费”(consumption),也就是王德威所提到的“过度之经济”。这种过度之经济,从来不平衡利弊,也不图回报,它是纯粹的浪费。人类反常的性行为(即不以生殖繁衍为目的),特别是毫无节制的征性逐欲,就属于这种经济。在文学叙述中,它到底有何价值?晚清小说家为何要如此浓墨重彩地来渲染它?并且,一反常态地从事色情文学的写作?

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我们还是需要回到巴塔耶。从哲学和人类学的角度,他曾将世界划分为两类:世俗世界和神圣世界。前者建立在普遍人性的基础之上,随着人类理性的发展,人性逐渐战胜了兽性,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并且建立了一个世俗的世界。但是,由于兽性只是被暂时地压抑,而无法被彻底根除,所以一有机会,它就会对人性伺机反扑。为了遏制兽性,人类确立了一系列的道德、禁忌和法律。这些道德禁令——它们作为人类文明的标志——不仅将性定义为色情,而且对它实施围追堵截,将其驱赶到阴暗的角落。这样一来,性不但被妖魔化了,同时也被非法化了,只有夫妻之间的性事才得到世俗世界的许可。巴塔耶所倡导的神圣世界就是对世俗世界的僭越。按照黑格尔的辩证法,如果说人类摆脱兽性确立起人性是辩证法的“第一次否定”,那么,“第二次否定”就是通过对欲望和色情——这种“过度之经济”——的充分肯定来冲破世俗世界的禁令。因此,这种性欲耗费不再是人类兽性的回归,而是一种源自个体生命的抗争精神。它违逆的目标,就是世俗世界的纲常伦理,以及各种法律和禁忌。

当然,人只能生活在世俗的世界里,需要接受世俗世界的各种规制。只有在诗人、作家、艺术家的笔下,人类才会遭遇这个神圣的世界。晚清小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得到了西方评论家的认可,并被他们赋予了完全不同于传统浪漫和情色小说的现代意味。当有人执意从伦理的角度对晚清作家痛加挞伐时,王德威却强调指出,“恰恰因为晚清狎邪作家缺乏节制,甚至视之作为一种方便,传统定义的性、经济与文学的交换,以及消费、生产、支出等模式才不得不重新估算。我们必须正视晚清狎邪小说在想象性、经济与文本资源上的独特方式”(70-71)。这些作家不仅翻新了前代小说的欲望叙事学,而且通过对传统价值观念的颠覆促进了现代个体意识的兴起。

在小说《禽海石》中,秦如玉和少女阿纫是一对相爱的情侣,但是由于父母反对他们订婚,以及接踵而至的战乱使他们各奔东西。当秦如玉在战乱中千辛万苦地找到阿纫时,她已经遭人所害,奄奄一息。韩南教授认为,这部小说有一个“巨大的缺陷”,“应当对他的悲剧负责的,并非传统的婚姻制度。他的父亲虽然起先反对订婚,但最后还是被说服了。从另一方面说,少女的父亲尽管保守,但还是一直愿意接受这对年轻人的婚事的。悲剧的首要原因是义和团起义和外国入侵的威胁使得其中一个家庭被迫逃亡,恋人因而分离。如果两家一同逃走,或都没有逃走,恋人们可能就会按照原定的计划结婚”(“中国”179-80)。这一分析尽管有他的道理,却过分拘泥于小说的叙事形式,而忽略了它的思想价值。如果没有这个“巨大的缺陷”,它怎能成为“晚清写情小说中的奇葩”(胡全章12-5)?它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作者假借这种叙事形式塑造了新的个体——他不再是旧思想、旧观念的

奴隶,而是具有反思和批判精神的现代人。正因为如此,这部小说脱离了它的庸俗情节而具有了现代性。

二、晚清小说中的“假凤虚凰”与“女性想象”

晚清小说在欲望叙述方面还大胆涉足禁忌,即同性恋的问题。李渔的小说《男孟母教三迁》就是典型的例子。故事的主人公尤瑞郎为了向自己的“丈夫”表白心迹,自切男根。后来,“丈夫”蒙冤死后,他含辛茹苦地将“丈夫”与前妻所生的儿子养大,帮助他考中了科举,并在京畿做了高官。尤瑞郎的善行终于为他赢得了“男孟母”的称号。韩南认为,这一故事不仅突破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异性恋爱”、“异性婚姻”、“烈妇贞女”),而且大胆挑战了已成定规的封建伦理(“创造”100)。这一评价有些夸大,或者说,他并没有看到这部小说的限度。这部小说看似戏弄了中国传统的伦理成规,特别是根深蒂固的异性恋关系,然而,难以抹除的是它在人物设计和情节编织方面所潜藏的父权制痕迹。因为在李渔的眼里,尤瑞郎不是一个“男同志”(Gay),而是一个十足的“女人”,他自切男根就是这一性别身份的彻底完成。

后来,陈森在小说《品花宝鉴》中也倾力描摹一出男扮女装、假凤虚凰的好戏。但是,小说在人物的设计上也暴露出和李渔作品同样的弊病。主人公杜琴言尽管被塑造成一个理想的爱欲形象,但是,“他受赞叹的原因,不在于他本身,而在于他所形似的人物。在小说中他从来没有被视为实实在在的欲望目标,因为在欲望的辩证关系中,他本人只是一个代替品。小说的无形动力很吊诡的是‘女人’而不是(同性恋或者异性恋的)男人”(王德威80)。由于性别模式的误嵌,所以王德威认为,“陈森因袭传统为女性而设的修辞论述来描写那些易弁而钗的男子,这与其说颠覆了,不如说强化了旧有的异性爱欲的纲领;而原所谓的为女性而设的修辞论述,根本是源出于以男性为中心的价值体系,所谓的佳人美色,其实是满足了男性作家及读者的想象,女性多半无缘置喙”(79)。

在晚清社会,女性应该如何走出父权制的阴影,并完成自身的性别确认?带着夸张的修辞,梁启超提到了罗兰夫人:“十九世纪欧洲大陆一切之人物不可不母罗兰夫人;十九世纪欧洲一切之文明不可不母罗兰夫人,何以故?法国大革命为欧洲十九世纪之母故,罗兰夫人为法国大革命之母故”(夏晓虹346)。为了塑造新式国民,梁启超搬出了这个法国大革命的女英雄,并倡导广大作家要以她为榜样塑造女性形象。在小说《女子权》中,思琦斋就刻画了“贞娘”这个东方式的罗兰夫人。她不但敢于反抗自己的婚姻,还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甚至创办女报《女子市民》,开启民智。海天独啸子的《女娲石》也富有革命意义,小说一开始,作者就借用欧洲历史来强调女

性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他从埃及女王的历史故事中得到灵感,宣称中国男人的软弱无能,并且把建立独立国家的希望寄托在一些非凡女性的身上。在天香院——一个被设想成乌托邦的女性王国——里,她们发明了很多的高科技,包括电车、电报、机枪、麦克风、自动进食系统和人工授精。“当作者将女性与现代的进步观念和科学技术联系在一起时,他强调要冲出男性的束缚,保持女性的纯洁和独立,并废黜爱、色欲和性本能”(刘剑梅282)。刘剑梅认为,海天独啸子所提出的激进的女权主义话语,在压抑男性的同时,其实也去除了女性的身份特征,因为她们最终成为了未来民族国家的政治代言人。事实上,她们并没有发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也从来没有获得作为女性个体的主体性。

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到底如何来想象女性?作为历史小说,曾朴的《孽海花》把女性形象从乌托邦的王国带回到现实之中,塑造了傅彩云这个身份混杂的形象。王德威给予了她这样的评价:“傅彩云既是肆无忌惮的妖,又是自我解放的新女性;既是骇人听闻的悍妇,又是革命女英雄”(44)。她游刃有余地穿梭于妓院和家庭之间,家与国之间,国内与国外之间。更有趣的是,复杂的角色身份使她逾越了社会空间的边界和传统的道德边界,逾越了旧道德对中国女性的束缚与限制。她基本按照自己的欲望本能行事,敢于践踏所谓的“三从四德”,不怕公开和不同男人所发生的风流韵事,其中包括八国联军的首领瓦德西。当金钧发现她与人通奸而气急败坏地质问她时,她不但毫无惧色,还大胆地为自己辩护:

“可我倒是要问声老爷,我到底算老爷的正妻呢,还是姨娘?”雯青道:“正妻便怎样?”彩云忙接口道:“我是正妻,今天出了你的丑,坏了你的门风,叫你从此做不成人、说不响话,那也没有别的,就请你赐一把刀,赏一条绳,杀呀勒呀,但凭老爷处置,我死不皱眉。”雯青道:“姨娘呢?”彩云摇着头道:“那可又是一说。你们看着姨娘不过是个玩意儿,好的时候抱在怀里,放在膝上,宝贝贝呀的捧;一不好,赶出的、发配的、送人的,道儿多着呢!就讲我,算你待我好点儿,我的性情,你该知道了;我的出身,你该明白了。当初讨我的时候,就没有指望我什么三从四德、七贞九烈,这会儿做出点儿不如你意的事情,也没什么稀罕。你要顾着后半世快乐,留个贴心服侍的人,离不开我,那翻江倒海,只好凭我去干。要不然,看我伺候你几年的份,放我一条生路。我不过坏了自己罢了,没干碍你金大人什么事。这么说,我就不必一死,也犯不着死。若说要我改邪归正,啊呀!江山可改,本性难移。老实说,只怕你也没有叫我死心塌地守

着你的本事嘎!”(曾朴 246)

这段话,可以说是声色俱厉,透露出强烈的反抗气息。它反抗的对象不仅仅是封建的道德伦理,还有男女之间不平等的性别秩序。“她用戏仿的方式嘲笑了几千年来中国男性规定的妻妾成群的制度。通过对男性思维逻辑的模拟,她表面上似乎重复和加强了男性话语,实际却在重复的过程中解构了男权主义话语。更重要的是,傅彩云不仅讽刺了旧的性别认同,而且成功地表达了她个人的声音”(刘剑梅 289)。正是在这点上,曾朴的《孽海花》比起思琦斋的《女子权》和海天独啸子的《女媧石》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从女性主义角度来说,傅彩云作为“时代新人”的形象是有问题的,这不是由于她的身份(妓女和侍妾),而是由于性。曾朴在设计这个人物的过程中,将她的一切都建立在本能欲望的基础上,包括她后来成为拯救民族危难的女英雄,也不过是淫荡结果的巧合——与联军统帅瓦德西偷情的副产品,这如果不是矫情,那就是作为男性作家在想象女性时难以摆脱的父权制思维。所以,过分夸大这一小说人物的价值,或者将她确立为过渡时代的“新女性”,显然有失公允。这一缺陷,援引李欧梵的话说,就是晚清小说家“未完成的现代性”。

三、晚清小说中的“城市书写”与“欲望表征”

《风月梦》和《海上花列传》不仅是晚清狭邪小说的代表,同时也被研究者推为以“近真”笔法描写城市生活的力作。“这两部小说都为我们提供了中心城区的精确路线,列出了街巷名目,这是它们区别于前人小说的一个特征”(韩南,“中国”32)。对此,韩南以《风月梦》为例指出,“与地理学家不同的是,小说家向读者展示一个城市,根据的往往是他笔下人物的观察和活动,可以说,也就是目力所及,足迹所涉的城市。他更能向我们展示人们对一个城市,对它的文化和传统的观感和理解,一句话,即对它的精神气质的观感和理解。就这两方面来说,《风月梦》在中国小说中都堪称是一个新的发展”(“中国”33)。小说第三回,陆书在姑爹家安歇一宿,第二天清早起来带着小喜子拜访朋友袁猷,小说对他们的行走路线展开了照相式的描写:

小肠小喜子拿着拜贴,捧着小帽,夹着衣包,拎着水烟口袋跟随出了姑爹家大门。由南河下到了常镇道衙署前,那照壁紧对着钞关城墙门,那里是水马头,来往行人拥挤不开。[……]陆书行过常镇道衙门,转弯到了埂子大街,见有许多戴春林香货店。也有的柜台前许多人,买香货的、买油粉的纷纷拥挤;也有的柜

外冷冷清清。陆书初到扬州,不知何故,又不便问人,遂过了太平马头,到了小东门外四岔路口,问了店面上人路淫,一直向北,进了大儒坊,过了南柳巷,到了北柳巷,问到袁猷家门首。(邗上蒙人 11)

这样的文字在小说中俯拾皆是,它们不仅增强了小说的现场感,而且织就了作者和读者对城市的想象。在谈到都市文化时,我们通常关注的仅是它的物质层面,而对它的表征形式——呈现在书籍、广告、影视媒体上——往往容易忽视。李欧梵认为,都市物质文化的基础和想象的层次之间其实是互动的,物质文化的发展能够刺激人们对都市的想象,反过来,人们对都市的想象也能够推动物质文化的发展,虽然有时并不那么直接(126)。

事实上,城市不仅仅是地理学上的客观存在,它还是一个欲望化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每个人都被金钱和欲望推搡着。为了谋利,尔虞我诈,弱肉强食。《风月梦》第二回叙及埂子街妓院“坠子家”新买来一个女孩,名叫秀红,被老鸨百般折磨,十六岁就做了娼妓。《海上花列传》中的“讨人”也是妓院买来揽客的女孩,有的“讨人”因为木讷,经常遭老鸨的毒打。妓女杨媛媛和赌场老板周少和串通,设局骗取恩客李鹤汀数万洋钱。妓女黄翠凤原本是罗子富的相好,却暗中配合老鸨窃取了他装有公司重要文件的拜盒,然后对他敲诈勒索。洪善卿虽然身为参店老板,却以帮闲为业,整天帮着为人调停事端,从中谋取丰厚的回扣。在大都市里,货币经济是权衡人情的唯一标准,“货币经济所造成的现实生活的计算之精确性,对应于自然科学的理念,也就是说,把整个世界转化成是一个算术问题,把其中的每一部分都固定在一个数学公式之中。正是货币经济使得这么多人的日常生活都充满了权衡、算计、清点,以及把质的价值化约为量的价值”(西美尔 210)。

人情薄如纸,私利厚于天,这是这两部小说共同呈现的城市镜像。在《海上花列传》中,来自农村的张小村在米行找到了工作就瞧不起一同来上海淘金的赵朴斋。赵朴斋在拉东洋车时,熟人唯恐避之不及,甚至包括自己的亲娘舅。当他后来富裕起来,衣着光鲜时,别人又另眼相看。义中粮行的伙计吴松桥嫌自己的父亲无能,拒不相认。面对亲姐妹的困境,洪善卿表现得竟然冷漠无情。这就是城市与现代性。路易·沃斯曾将现代城市(工业社会)同传统的乡村(民俗社会)进行了对比。他认为,都市主义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由于都市人来源广泛,背景复杂,兴趣殊异,流动频繁,因此,主宰着民俗社会的血缘纽带、邻里关系和世袭生活等传统情感不复存在。都市人需要同大量的他人打交道,但是这种接触式功能主义的、表面性的、浅尝辄止的、非个性化的。‘都市社会关系的特征是肤浅、单薄和短暂。’共同情感的缺乏、急剧

的竞争、居无定所、阶层和地位的差异、职业分工引起的个体的单子化,使人和人之间的沟壑加深,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个体并没有被温暖所包围,而是倍感孤独”(汪民安,《现代性》12—13)。用爱伦·坡的话说,在都市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人群中的人”(151)。

《风月梦》和《海上花列传》的作者都是怀才不遇的市井文人。他们生活在极端物化的城市之中,对于世态人情可谓烂熟于心。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历史的车轮,根本无法摆脱社会的现代性,所以他们只能在自己的作品中寻找精神的安顿。邗上蒙人一方面极力描述扬州的繁华景象,另一方面将希望寄托于中国传统的乡村。韩邦庆则设想了一个城市中的方外世界——“一笠园”。对于他们来说,即便不能像古人那样选择归隐,也可以借园林适心,这是由凡入圣。通过这种文学方式,不仅能够化解人们因现代性而造成的情感撕裂,也能够使作家内心的焦虑得到象征性解决。因此,我们认为晚清狭邪小说看似淫靡的外表之下,其实也潜藏着作家感时忧世的人文精神。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韩南《创造李渔》,杨光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

[Hanan, Patrick. *The Invention of Li Yu*. Trans. Yang Guanghui.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0.]

——:《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徐侠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

[——. *The Rise of Modern Novels in China*. Trans. Xu Xia.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0.]

邗上蒙人《风月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Hanshang Mengren. *A Dream of Wind and Moon*. Beij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90.]

胡全章“《禽海石》:晚清写情小说中的奇葩”,《湖州师范学院学报》3(2007):12-15。

[Hu, Quanzhang. “Stones from ‘the Fowl Sea’: A Rare Flower of the Novels on Emotion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Journal of Huzhou Normal College* 3(2007): 12-15.]

李欧梵《未完成的现代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Lee, Leo. *Unfinished Modernit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刘剑梅《革命与情爱》,郭冰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

[Liu, Jianmei. *Revolution Plus Love*. Trans. Guo Bingru. Shanghai: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9.]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

[Lu, Xun.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 Nanjing: Jiangsu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7.]

爱伦·坡《爱伦·坡精选集》,刘象愚编选。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

[Poe, Edgar Allan. *An Anthology of Edgar Allan Poe*. Ed. Liu Xiangyu. Jinan: Shando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9.]

齐奥尔格·西美尔《时尚的哲学》,费勇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

[Simmel, Georg. *The Philosophy of Fashion*. Trans. Fei Yong, et al. Beijing: Culture and Art Press, 2001.]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宋伟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Wang, David. *Suppressed Modernity*. Trans. Song Weiji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汪民安《色情、耗费与普遍经济》。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Wang, Min'an. *The Erotic, Consumption and General Economy*. Changchun: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现代性》。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 *Modernity*.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5.]

夏晓虹《梁启超文选》。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

[Xia, Xiaohong. *An Anthology of Liang Qichao's Writings*. Beijing: China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Press, 1999.]

曾朴《孽海花》。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

[Zeng, Pu. *Flowers from the Evil Sea (Nie Hai Hua)*. Beijing: Liberation Army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2000.]

(责任编辑:查正贤)